

捐献器官：怎样实现“无人干预”

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江苏等多地红十字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每成功进行一例器官移植,医院一般要向地方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而且相关账目从未公开过。

人体器官捐献 2/3 资源被控制? 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成为部分机构牟利的工具? 这一新闻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红会掌握器官资源?

事实上,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依托于红会建立。从深圳市红会官方网站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组织结构图显示,由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各省市级人体捐献办公室均设在同一级别的红会。

2010年,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下发《关于印发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通知》。“这个文件详细列出了红会在人体器官捐献中的职责,包括宣传动员、器官捐献登记、救助、见证器官捐献、缅怀等。”深圳市红十字会救护及青少年部部长林瑜告诉记者,但是红会的人不会参与器官摘取及移植的过程,更谈不上垄断资源。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在介绍媒体采访时则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共有器官协调员203名,其中只有50名属于红会工作人员,其他人员都来自各地器官移植医院。协调员通过各自医院构筑的网络,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报备给各地中心;同时,告诉给来源上述网络的OPO(器官获取组织,一般从属于器官移植医院),由OPO通过分配系统进行分配,协调员全程见证。器官移植医院把等待移植患者信息录入全国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形成等待者名单,最终大约有1/5的潜在捐献者能够实现器官捐献。

林瑜告诉记者,虽然有一些器官捐献登记者,但目前人体器官来源主要还是医院。“协调员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奔波在各大医院,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然后与医院的OPO联系。”

此前的媒体报道称,协调员在选择

哪家医院的OPO时或有利益上的考虑。“我们三个协调员,为了便于管理,每个协调员对应一个OPO,不存在选择谁的问题。”林瑜说。

“公众质疑的是我们为什么会重点选择几家医院的OPO合作,这一方面因为它们是它们主动找我们的;另一方面(从移植的效果考虑)我们会优先选择本地医院。”她进一步解释道。

如何实现“无人干预”的器官分配

正是为了落实《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要求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器官分配原则,由香港大学受原国家卫生部委托研发的一个自动化计算机系统,即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于2011年4月在全国164家器官移植医院正式投入运行。该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医学数据作为唯一排序原则,对每一个完成捐献的器官,执行自动化的,无人干预的分配。

据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赵明教授介绍,在移植科等候的患者都需要在这个系统上登记排队。“合适的供体越新鲜,移植效果会越好。”他解释称,所以,一般来说,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若有患者捐献供体,在该院优先使用,不合适的马上由系统就近调配给本地区其他医院,若本地区无合适者再进行跨省交流。

此前,有媒体引用今年5月在深圳召开的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上的报告数据称,全国三分之二的捐献器官未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分配。“正如刚才我所说的,协调员的工作只到捐献见证为止,根本不参与分配,所以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为什么没有进入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官方为什么不能强制规定必须全部进入系统呢,这个板子不能打在红会身上。”林瑜说。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协调员没有账号,只有OPO有账号,有权分配和共享,资源掌握在红会手中一说并不成立。

“其实,抵制系统的不是我们,而是医院的主任们。”“部分未通过系统,这个信息谁知道,貌似只有这些移植医院在操作并且知情。”在各地协调员交流的QQ群里,他们和公众一样,做着各种猜测。

在近日召开的国家卫计委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对此的解释是,器官捐献一直在做试点,分配系统也一直在做试运行,不可能所有的都纳入到系统之中。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工作人员给媒体的答复是,不少医院不愿意使用这个系统,因为担心花费了很多精力获取到的器官,在自己医院排队的患者却得不到,要分到其他医院去。

但邓海华称,目前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稳定运行,即将在全国正式运行。国家卫计委将同步出台《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的暂行规定》,强制所有的捐献器官都通过这一系统分配。

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

由于涉及人的生命以及道德伦理问题,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艰难前行。

记者三年前采访的一位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领域里积极践行者此次却在电话里说:“最近两年,我不是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事了,这里面太复杂,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有很多问题。”

“协调员去医院放展板,导诊台的护士都能把我们撵出来,说白了,协调员就是谁都能‘撇’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部门给我们的支持能有多少?”林瑜说,因传统观念的束缚和体制的不健全,器官捐献在国内开展的举步维艰。红十字会无任何行政命令权力,往往因医院的不配合或是家属的不同意就让协调员多日甚至几个月的辛苦工作落空。

同时,在机构方面,目前只有天津市设立了省级管理中心,绝大多数未设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办公经费难以筹集;在法律方面,可依据的法律只有2007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对红会开展这项管理工作,只提出了“依法参与器官



今年清明,福州举行追思会悼念遗体器官志愿捐献者。

捐献宣传等工作”。对器官捐献的获取、分配与共享等工作,没有更多的法规来支持。

而高新谱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避免利益冲突。隶属于器官捐献管理部门管理的协调员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见证作用不可替代,这也是整个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设计,此外,今后将参考国际经验制定、规范器官获取组织的运行规则,逐步推动OPO从移植医院脱离出来,和移植团队分离并相互监督。

他说,在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央编制办批复等文件的有力支持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被赋予了协调员资格认定的权力,近期将进行全国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培训及资格认定工作,此外,在卫生计生委(原卫生部)委托下承建的“国家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已取得重大进展,该系统由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近期将开通公众线上报名功能。

同时,红会及管理中心将对器官捐献体系进行完善。具体包括几项内容:今年年底前争取所有省份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推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对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进行明确和细化,同时积极推动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实现器官捐献信息全国联网等。

中国科技网 2013.7.16 文 / 操秀英

PX 项目为何难落地

PX,即英文 para-xylene 的简写,中文名是“1,4-二甲苯”,别名对二甲苯。这种石油化工品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是芳烃类化学品中和我们日常生活关联程度最高的化学品,虽然用途广泛,但近年来一直被公众描述为带有致命危害的恶魔。PX生产装置的建设计划,也在全国多地招致民众“狙击”。

作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议题,“PX困局”以及以其为代表的“化工恐惧症”,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日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认为,“PX困局”已非技术范畴内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人士对其安全性不存在争论,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企业的行为惯性,以及社会心态等复杂因素形成的信任危机,最终形成了“PX困局”以及“化工恐惧症”。

他坦率表示,遭到当地公众强烈反对后就宣布停建,也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建设性的方式。

这位中国石化原总工程师、副总裁同时强调,信息透明化以及更好的科普,才是解决“化工恐惧症”的有效之道。

到目前为止,全球最严重的PX项目事故是什么样的?

曹湘洪:自PX技术产业化,到2012年全球产量3848万吨、消费量3410万吨,全世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PX着火、爆炸、污染事件。

中国引进的第一套PX装置于

1985年开始投产到现在,28年里也没发生过重大事故,应该说PX装置是比较安全的。可以说,只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就能做到PX的安全生产。

从理论上讲,PX生产装置可能引发的最严重事故是什么?

曹湘洪:最严重的事故就是着火、爆炸。如果违反规定,把PX气体扩散出来,和空气充分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明火就会爆炸。不过就算泄漏出来,如果没有和空气充分混合,如果没有遇到明火,也不会发生爆炸。

一般来讲,石油化工生产装置中绝对禁止明火。一旦发生物料泄漏,我们会严格控制,让操作人员去处理泄漏的状况。

我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几十年,知道PX生产装置在全国的分布,譬如一些大型石化企业,都有PX生产装置。但我没听说过它们何时发生过安全事故,更谈不上PX装置的着火、爆炸。包括前段时间在漳州发生的事故,也不是PX装置的事故。

《瞭望东方周刊》:在PX生产过程中,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哪些?

曹湘洪:与一般的石油化工产品生产相比,PX装置的操作温度与操作压力都相对较低。在PX装置的操作工艺中,较高的操作压力是20多公斤,这在石油化工装置中属于低压。

我没有感觉出什么地方特别容易出事故。当然,如果不按安全规范去

做,肯定会出事故。物料泄漏以后,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发生着火、爆炸。

同时,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做到PX装置的安全可靠生产。PX生产过程中,物料没有腐蚀性,不存在设备的腐蚀问题,就不会有物料造成的设备腐蚀穿孔泄漏事件。

一旦某个区域的机泵、阀门损坏发生泄漏,就会通过现场的可燃气体报警器立刻告知工作人员,及时派出人员去事故位置维修处理。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可以按动紧急停车按钮把运行中的装置停下来,进行事故处理。

所以,现有的技术、装备完全可以保证PX生产装置的安全性。PX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可怕。我在企业管理生产、技术的时候,经常到PX生产岗位去,认识很多一线同志,没有听说有谁因为接触PX得了癌症,没有谁因为接触PX不能生孩子。

解环境焦虑症可有良方

PX项目一上马,公众就上街;公众一上街,政府就紧张。其实,与群体性事件本身比起来,事件折射出的公众的社会焦虑、环境焦虑,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雾霾锁城,挥之不去,河流、地下水、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事件频频曝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公众的神经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为了维护自身健康,公众不再允许周边增添新的风险源,哪

怕已经被证明发生风险的几率很小。

对那些可能引发环境问题的建设项目,决策部门很有必要摒弃关门决策的惯性思维,以更开放的心态保障公众参与,以更理性的心态直面公众质疑,以更包容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这是纾解公民环境焦虑的必经之路。

如何挽回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PX成了公众眼中污染、致病的象征符号。其实,业内人士都知道,PX并非传言所描述的那般可怕。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地,都有成熟的经验和先例,工厂和居民区相距不远也能相安无事。

台北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在这一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公众可以随时走入工厂,察看工艺流程;焚化厂每两个月要把运行状态的各个指标公开上网,市民可以质询废水、废气和废弃物的排放情况;台北市环保局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了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以随时上网监督;环保部门每年也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突击检测。

认识了、了解了,恐惧自然会消除;参与了、监督了,担忧自然会减少。企业与公众并不是天生的敌对双方。对于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坚冰,有专家指出,应尽快建立由当地居民、人大代表、中立的研究机构、环保NGO、媒体等组成的第三方监督制度,形成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管、居民监督的良性互动。

《瞭望东方周刊》2013.8.26